夜光杯

银川一家人

吴　霜

两年前，在北京的一次大型的声乐比赛上，我担任评委。有一对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到我身边。那个母亲皮肤有些黝黑，有一双大大的眼睛，眼睛里闪耀着热情的笑意，她告诉我他们是带着女儿从银川来参加比赛的。我注意到她身边站着一个大眼睛女孩儿，十二三岁的样子，个子不高，是个小胖子，女孩儿的眼睛里也闪耀着和她妈妈一样热切渴望的神情。这是他们的女儿，名叫甜甜，她非常喜欢唱歌，想跟我学习声乐，将来也成为一个优秀的花腔女高音。

两天后女孩儿的父母带着她来到我的琴房，我听了她唱歌，同来的还有他们的另一个更小的女儿，大概只有十岁左右，和姐姐不一样的是她很瘦，但是也很活泼。我听了甜甜的歌唱，她唱得很认真，只是声线显然还停留在童音的范围，声带还远没有生长成熟。我告诉甜甜的父母，甜甜只有13岁，现在学习声乐歌唱太早了一点，她的声带还处在生长阶段，这样稚嫩的年龄练声乐是不谨慎不适合的，因为稍不注意可能就会伤害娇弱柔嫩的小声带，一旦伤害了，就是永久性的毁坏，无法恢复，这个年龄最好还是先认真学习弹奏钢琴，打好乐理和音乐学习的基础，之后再学习声乐，那才是科学的学习方法。一直安静地站在家人身后的气质文静的父亲问了我一句：那您说，她多大了就可以正式学习歌唱呢？我说，至少要到15岁以后吧。

然后就到了两年以后的2021年。这中间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动荡，经历了整个世界的脚步似乎都停顿了的巨大冲击。我已经差不多忘记了两年前曾经来到我身边的那个带着婴儿肥的大眼睛女孩儿和那对希望女儿跟我学习声乐的眼神真诚的父母。等到疫情变得可控，生活的正常节奏逐渐开始恢复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这一家人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依然是一家四口，依然是真诚的眼神，依然是瘦瘦的妹妹，只是，甜甜变样了，变得很厉害，她长大了。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比实际年龄显得成熟些的少女，态度是大方的甚至有些成年人的沉着。十五岁半的甜甜，已经长到了1米67，完全没有了婴儿肥，大大的眼睛里还是和两年前一样盛满了问号。总觉得她想要说什么，然后还是她的妈妈说：吴老师您看看，甜甜现在可以跟你上课了吗？依稀记起了我曾经说过的话，过两年我可以正规地教甜甜唱歌的承诺，而这个可爱的孩子以及她可爱的一家人是一直记得这个承诺的。

她的文质彬彬的父亲说，那时听了您的话，这两年来我们一直让甜甜学钢琴，学识简谱和五线谱，打好学唱歌所需的音乐基础，就是为了两年以后再来北京找您学唱歌，希望她将来像您一样成为一个成功的歌唱家，当然如果她足够努力的话。

面对这样的一家人，我能说什么呢？这样的执着这样的认真努力当然会感动任何一个师长。于是我让甜甜再次来到我的钢琴旁，我要听一听她的歌唱，听一听她的声音变成熟了没有。那天，她跟着我的琴声唱了一首《我爱你，中国》。

音准、节奏都很好，这是两年来一直坚持学钢琴的结果。有时面对很多像甜甜的父母一样希望让小孩子学声乐的家长，我都会告诉他们应该先让孩子学好钢琴，这是学习一切音乐专科的基础，在等待孩子的声带变得成熟的同时让其学好钢琴，将会大大地帮助到孩子将来学习声乐时少走弯路，声带需要时间成长，而当声带长成，孩子的琴技、听力、音准和节奏感也已达标，这时开始歌唱方面的专业训练，绝对事半功倍。我对许多望子女成龙凤的家长说过多少次，但是真正记得我说的话并严格认真地实施了的似乎只有银川的甜甜这一家人。

今年8月1日，变成大姑娘的甜甜和她的爸爸妈妈，还有依然是瘦瘦的灵动的妹妹就是这样连续五天来到我家，我正式地给她上声乐课，从最简单的单音阶练习起步，教她怎样歌唱。每天早晨，他们在宾馆吃过早餐，休息一会儿就乘车或乘地铁来到我家，甜甜最喜欢最享受的歌唱课程就这样开始了。我告诉她，她让我想起了自己十六岁时初学声乐的经历，那时我的启蒙老师是郭淑珍先生。从踏进老师家门时起，我就停止了一切无章无法随心所欲的歌唱方式，走上歌唱的正道。甜甜妈妈高兴地说：我们甜甜现在也走上正道了！

甜甜连续上了五节课，从音阶练习开始，同时练唱“孔空练声曲”和一些浅程度的歌曲。甜甜的声音已经完全成熟，有很好的音色和宽广的音域。她的眼睛更加明亮，兴奋开心的情绪一天比一天浓厚。但是很快，他们要回家了，我给她布置了初步的练习计划，在音乐书店里购置了几本乐谱和歌曲集，以便回家继续练习。

我发现这一家人十分抱团，不管做什么都喜欢同步，倾巢出动。这是一个多么紧密的充满爱的家庭啊！他们说甜甜以后还是要来北京跟我上课，会利用每一个长假的时间，如果间隔太长就视频远程上课。下一个日程应该是在今年的十一长假，我说下次来就妈妈陪着吧，不用花费那么多啊。听了我的话，一家四口相互对视一会儿，笑了。

十一长假，如果这一家人又出现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意外的。

爽心园

书法　姜　楳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一颗热疖头的戏剧收场

曹景行

半年多前我得了癌症，浮过生命海，辛苦挣扎上岸。其实此后半年多比预想的辛苦许多，还节外生枝多出一颗热疖头，就长在下巴下方的颈脖上。

小时候生过几次热疖头，如额头上，大概是外面玩多了，太阳晒多了。等它红了、肿了，有脓头了，挤掉就完事，最多十天一个星期，好像也不用药。

成年以后就没这回事，不料到七十四岁了又来一次，而且是在病中。这颗热疖头的成长过程也很不同凡响。

三个多月前发现脖子下多了一个疙瘩，很快变成黄豆大小，不挤不压就不疼。一天天拖过去还是那样，只是稍微大一圈。

那时我在医院治疗，其间用过各种抗生素和非抗生素的消炎药，那疙瘩似乎没受啥影响，不见小，也不长大，就那样“僵脱了”！还做了一次超声波检查，说里面发炎的东西仍在寻找“出路”。那就耐心等吧，不知还要多久。

又过了一个多月，终于稍有变化。有时洗脸后发现疙瘩边上有点点血迹，用碘酒消消毒就结了条小痂。一天天下来疙瘩略有缩小，仍不知最后如何收场。直到前几天洗澡后，发现上面掉下来一整片的痂，里面露出红色的鲜肉。一时不知所措，只得先用碘酒消消毒，再涂上一层抗生素药膏，外面覆盖护创胶布。

第二天早上赶去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概等同于早先的地段医院吧。

挂了外科，不用怎么等就看上了。医生是位男青年，我刚坐下扯开胶布，他看了一眼马上说我们这儿看不了，可能会烂，要去区里那所三级医院，要用那儿专门的“凡士林纱布”。我还没回过神来多问几句，只得离开诊室，回家路上还在纳闷：这家地区医疗中心挺新的，硬件看起来不错，弄得干干净净，但如果外科连一个疖子都对付不了，还能看什么病?!另外，区里那家三级医院拥有的“凡士林纱布”似乎挺神，那为啥不能下发给地区中心使用，想想应不会涉及专利保护吧。

暂不按医生指点去那家三级医院，下午要到医院开化疗的针药，顺带去外科门诊请教，以释疑团。接诊的也是年岁不大的男医师，他看了疮口也很快就说：不是快好了吗？快好了？我又感到一次冲击。他说，不用再贴胶布，让疮口多暴露在外。我问要不要用碘酒消消毒，他说“那可以”。我真的松了一口气，回家后就如此办理。但总还不放心，不断注意伤口变化，不时用手机自拍观察。24小时过去了，疮口已完全干了，面积缩小一半，疖子本身也明显缩小。

应该就这样发展下去了吧？真是戏剧性的收尾，即使可能还要拖上些时间。想起文化人喜欢讲的一句话：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那么，一颗热疖头在每个医生眼中都会有自己的解读？我如果去了区里那家三级医院看上门诊，第三位医生又会有怎样的诊断？会用“凡士林纱布”吗？

“知行合一”的吴贻弓

金　莹

近日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老师撰写的《流年未肯付东流——吴贻弓传》，读到一些有趣的往事，有许多是电影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在戈壁滩上拍戏时，高原反应带来身体的种种不适，头痛、头晕、疲倦、呼吸困难，牙周炎复发的吴贻弓半边脸都肿了，还坚持在滚烫的沙漠上坚持工作。再比如，为了完美呈现剧本中的一句“太阳落山了”，吴贻弓导演在气候变幻莫测的沙漠里足足拍了一个星期的落日。至于一些电影拍摄过程中造成的遗憾，他会感到十分羞愧。“在他看来，影片的这个缺点完全可以避免，是自己的失职。”

还有一些故事则显示出吴贻弓导演性格上的坚韧与可爱。在下放到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的那段时间里，虽然遭遇精神和现实生活的双重打击，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放任自流，反而自学生物知识，对制药流程进行改进，竟然让生产线的日产量提高了三倍。于是，“吴贻弓从此成了人见人爱的小吴”。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吴贻弓导演的印象更多的是由他的作品构成的。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为几代人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巴山夜雨》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城南旧事》的细腻克制，《姐姐》的真实质朴，《流亡大学》的家国命运，《阙里人家》的文化传承，《月随人归》的人性至善……这些电影史和评论家所下的定论对于以前的我来说，有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茫然。但是，在看了传记中看似无关其实彼此牵连的诸多细节后，我似乎有些从内心理解了石川对吴贻弓导演的评价：“一个诗意的现实主义者”，“一方面，他的美学观念指向儒家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他又立足于现实的土壤当中，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现实提出的任何的问题和挑战。”

听这段话是在数年前上海市文联召开的“心系电影　德艺双馨——吴贻弓导演艺术与文化精神纪念座谈会”上。在这个座谈会上，我还听到了许多人对吴贻弓导演的真挚追念。我至今记得导演成家骥说了一段话。作为一位曾在吴贻弓八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作品中先后担任了场记、导演助理和副导演的“追随者和合作者”，成家骥导演讲述了自己初入电影界的经历：他一开始对电影导演这一行可说是一窍不通，担任场记工作时，连一张场景表也制订不出。“作为导演，吴贻弓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帮我完成了第一张场景表的制订。后来，我制订的场景表十分详细，把群众演员数精确到个位数，连道具的类别和数量都有要求，这都得益于吴贻弓对我的示范和开导。在我人生的困难期间，他同情我，理解我，多次为我流下热泪。他曾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好好的，我们一起干。’”

我也还记得，上海市文联主席奚美娟谈到上世纪90年代召开的一次她的个人表演艺术研讨会，吴贻弓出场作了压轴发言。“吴老师在发言中没有一味地夸奖我，而是对我的表演提出了许多希望和将来努力的空间，听得出来他对我的表演优点和不足都做过认真思考，语重心长，让我非常感动。”当年曾追随吴贻弓拍摄《城南旧事》《姐姐》等作品的导演江海洋也说道，“身为大我几辈的尊长，他始终对我以诚相待。拍摄的时候，即便我因为经验不足而造成问题，他也从来没有责备过我。他尊重每一位成员，使我懂得了教养的含义。”

有谦谦君子之德，才有谦谦君子之作。吴导的作品为几代人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作品，而支撑了这些美好深刻的记忆的，既是导演美学风格上对民族诗学的回归和超越，也是吴贻弓导演个人品格和情怀的一种外在体现。“吴贻弓先生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电影理想、践行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用自己的作品书写着隽永的艺术追求，书写着真挚的家国情怀；用自己的言行诠释着德艺双馨的内涵，诠释着电影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如今再看这段数年前的评价，我开始读出了每一个字背后的重量。

十日谈

学艺先学德

责编：杨晓晖

当刘德华反问为什么大家要夸他，请看明日本栏。

捡来的孩子

王　晔

没错，我一直都说，我是我们家最笨的那一个呢。

举个例子吧，我小时候，大伯大妈盯着说我是捡来的，说得有鼻子有眼，煤堆上捡的，兴化的农民开着大粪船来城里，把我扔在煤堆上。

“就不是”，我强忍住气，绷着脸说，也只能说出这三个字。

“就是。”明明看得见人家都要含不住泪了，大妈还要一边这么说，一边奔到厨房里，把我爸爸的一件旧棉袄，一件退役为焐饭锅好帮手的旧棉袄拖来：“你看，你刚捡回来时就是裹在这里头保暖的，那个冬天，特别冷。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那个冬天的确特别冷，我想起妈妈常说我出生的那个冬天几乎不见太阳，我的头和那个冬天的其他襁褓里的头一样成了乒乓球，一捏一凹塘，瘪下去。

乒乓球头的旧伤疤猛然让人揭开，加上这突如其来的新伤，我终于放声大哭，悲愤至极。妈妈和爸爸立刻说：“拿你开心的呀，真是个傻丫头。”然而一丝淡淡的不安和怀疑过了很久才彻底清除。

我妹妹和我当年一般大时，也不过五岁，大伯大妈也拿这话戏耍她。我紧张地听着，想着妹妹一哭我就立刻冲出去揭穿这千古的谎言。

妹妹竟嘿嘿地笑了：“不可能！”

大伯大妈来了劲，要和妹妹说说理：“还不信了，还不可能了！”

妹妹说：“妈妈爱吃青菜心，我也是，爸爸走路是那样甩胳膊的，我也是！”

五岁的妹妹当然不知道“遗传”这个字眼儿，但她说出了大伯和大妈无法反驳的两个事实。

没错，想起来就笑痛肚皮，家人和邻里一直都忍不住的，笑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儿怎就能和一个四十一岁的一米八二的男人一样，摆动着胳膊走路的。

还好，这捡来的孩子的说法如今似已绝迹。我们这一代里也有人到成年还为此苦恼的。我们逸圃大院第一个进老丁家的长女三十岁上做了母亲，还是忍不住摸到我外婆家，认真地问老街坊里她最信得过的老太太：“赵家外婆，您一定要告诉我一句实话，我到底是不是捡来的。”

她有个被奶奶和父母宝贝着的弟弟，如今我怀疑一定是这个缘故，她才一直记着“捡来的”话头儿。

草亭秋歌

王养浩

一

启窗凉风进，屈指出暑临。侧耳不闻树蝉鸣，举目秋意吟。挥斥酷日疫情，白衣前行，汗透衣襟。

二

十五玉盘艳，守卫国门前。九州灯火闹团圆，举樽望蟾娟。香饼寄自家园，饼香心甜，军营欢喧。

三

昨日风雨骤，今朝日出头。扶栏莫叹惊衰柳，叶落当知秋。休指残荷孤舟，金风雁啾，菊香芳洲。